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毛主席

论 宣 传

湘潭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六年九月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毛主席

论 宣 传

(试编本)

湘潭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六年九月

目 录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摘录).....	(1)
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摘录).....	(11)
马克思致卢格(1843年9月).....	(16)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21)
马克思:《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	(32)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出版启事.....	(37)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3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8月4日).....	(42)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 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摘录).....	(44)
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	(52)
列宁:从何着手?	(56)
列宁:评《自由》杂志.....	(65)
列宁:给谢·伊·古谢夫.....	(67)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69)
列宁:给《涅瓦明星报》编辑部.....	(77)
列宁:谈谈总结和事实.....	(82)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¹ (摘录)

马 克 思

《莱比锡总汇报》在全普鲁士境内的查封

科伦12月31日。德国的报刊在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下进入新的一年。《莱比锡总汇报》最近刚刚在普鲁士国家各省被查封这一事实，足以打破轻信者对行将来临的巨大让步所抱的各种扬扬自得的幻想。在萨克森书报检查制度下出版的《莱比锡总汇报》是由于讨论普鲁士的问题被迫停刊的，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再想不受检查地讨论我们的内部问题了。这个结论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谁也不会否认它。

加在《莱比锡总汇报》头上的主要罪状大约如下：

“该报只报道一些传闻，后来发现这些传闻至少有一半是捏造的。此外，该报不满足于断定事实，而且还要追根究底。尽管该报的见解有时是错误的，但它总是十分自以为是地而且往往带着恶毒的激情来发表这些见解。轻浮、‘不谦逊’、‘幼稚’乃是该报全部行为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该报行为不端。”

假定所有这些罪状都是有根有据的，那末，试问这些罪状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的任性呢，或是用来反对方兴未艾的、年轻的人民报刊的必然性呢？问题是关于仅仅某一类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

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报刊，在其存在的初期都表现出德国报刊的那些特征，而每一种报刊也都受到德国报

刊曾经受到的那些指摘。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的”方针，这种方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报刊的敌人也是很喜爱的。

最近不断向年轻“报刊”发出的种种责难是相互排斥的。他们说道，请看看吧，**英国和法国**的报刊所执行的方针多么坚定、彻底和明确。这些报刊在生活中有着牢固的支柱，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完全成熟了的**社会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而你们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 and 利益，你们只是**捏造**这些思想和利益，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是偷偷地把它们塞给人民。你们创造政党的精神，而不是这种精神创造了你们。可见，他们忽而责备报刊**没有政党**，忽而又责备报刊**想弥补**这种缺陷创立政党的**愿望**。显然，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大声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也就没有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自觉了的人民精神的**政治思想**那样成熟、定形和周密。首先，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可靠**

性不像对这事件的**道德实质**（事件通过道德实质来表现自己的行动）那样关心。这是事实或是杜撰，——而事件却始终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真实的叙述**。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纵令年轻的报刊每天都在戕害自己，纵令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才得知自己的情况。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人民知道，它的报刊为它担当了各种罪过，并准备为它和它的荣誉忍受一切屈辱；它的报刊正在抛弃傲慢的外表以及自满和武断，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

所以，我们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做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做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虽然如此，我们在本文的开头还是把对于德国报刊的预兆只描绘成**看来**是阴暗的预兆。事情也正是这样，因为反对任何一种现象的斗争都是这一现象得到认可和这一现象的现实性与力量的**最初形式**。所以只有斗争才能使政府和人民（甚至报刊自己）相信报刊具有真正的和必然的存在权利。只有斗争才能表明，报刊的存在究竟是一种让步或是必要，是幻觉或是真实。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和《科伦日报》²

科伦1月3日。《科伦日报》在12月31日发表了一篇注有“莱比锡27日”字样的通讯，这篇通讯几乎是用一种欢呼的声调报道了《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可是在昨天这里收到的《国家报》³上，封闭这家报纸的内阁法令的日期却是12月28日。只要确定《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一事实，就能解开这个谜。显然，《科伦日报》认为不单可以捏造通讯，而且还可以捏造通讯记者，并且用自己的声音冒充光荣的莱比锡市的声音。《科伦日报》的“唯利是图的”幻想“巧妙地”混淆了概念。这种幻想把《科伦日报》报馆搬到莱比锡去了，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已不可能设在科伦。如果《科伦日报》编辑部在比较冷静的考虑之后，还妄图用自己的幻想把戏来冒充冷酷的真事实情，那末我们就不得不再报道一件与这篇神秘的莱比锡通讯有关的事实了，这件事

“完全越出了礼貌的界限，甚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中庸而慎重的人都认为太不谦逊了”。

至于说到《莱比锡总汇报》被封这件事，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承认《莱比锡总汇报》被指摘的所有那些缺点并不是纯粹捏造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人民报刊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一些缺点。因此，如果人们打算容许发展本身，那就应该像容许发展中的毛病那样容许这些缺点。

《莱比锡总汇报》并不是整个德国人民报刊，但它是这种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起初

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完全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像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质并散发蔷薇的芬芳一样。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

好报刊和坏报刊

科伦1月5日。关于“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我们已经听到过一些inabstracto〔抽象的〕言论。现在我们要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

《爱北斐特日报》⁴在1月5日注有“爱北斐特”字样的一篇文章中自评为“好报刊”。《爱北斐特日报》1月5日报道了这样一段消息:

“柏林12月30日。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反应。”

相反地,《杜塞尔多夫日报》⁵却和《莱茵报》一样,它报道说:

“柏林1月1日，《莱比锡总汇报》被断然查封一事，在这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等等。

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

《科伦日报》的解释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曾责备它“几乎是用欢呼的声调”来报道《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而它在对我们这一批评的答复中不仅谈到**有关日期**的问题，而且还谈到刊误的问题。《科伦日报》自己明白，“只要确定《莱比锡总汇报》被封的消息是12月31日从这里的邮局收到的这一事实，就能解开这个谜”这句话中的日期应该是（只是由于刊误才不是）“12月30日”。《莱茵报》，还有《科伦日报》正是在12月30日中午（必要时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从这里的邮局收到这个消息的。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科伦1月7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用其外交辞令所称呼的莱茵省的一家中庸报纸，即有节制力的、性情极温顺见解也最温和的报纸，歪曲了我们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把它解释为好像我们是说：**撒谎**是报刊的必然因素。这一家中庸报纸不是把它那崇高而可敬的注意力用到我们在这篇或以前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些思想上，而是从我们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个句子，这种做法并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伤害。正如

同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而对于那种把自己的局限性当作宝贝看待的政党来说，我们更不能这样要求。所以，我们并不准备研究这位**平庸**的精神界的女性居民为了驳倒我们她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只想研究她的实际行为。

首先，《莱比锡总汇报》过去的罪过被一一列举出来：它在汉诺威事件⁸中的所做所为、它那反对天主教的偏颇论争(hinc illae lacrimae!〔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令人感兴趣的是，可敬的报纸是不是认为《慕尼黑政治纪事》⁹的仅只方向相反的类似行为是罪大恶极呢?)、它的谎言谤语等等。于是，我们不禁想起了阿尔丰斯·卡尔主编的《黄蜂》杂志¹⁰上的一篇短评。它写道，基佐先生说梯也尔先生是叛徒，而梯也尔先生说基佐先生是叛徒¹¹，遗憾的是，二位说的都对。如果所有的旧式德国报纸都互相责难彼此过去的罪过，那末，诉讼就会围绕着表面问题兜圈子：罪过是由于自己的行动呢，还是由于自己没有行动？我们准备承认，和《莱比锡总汇报》比起来，这位殷勤的主妇是无辜的，她不仅在生活中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而且根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生活特征。

但是使我们遭到责难的文章并不是谈“莱比锡总汇报”往日的品质，而是谈它**现在的**品质；虽然用不着说，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封《爱北斐特日报》、《汉堡记者》¹²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莱茵——摩塞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信仰而有所变更。相反地，既然报刊的**生存权利**要取决于它

的思想方式，它的非法地位已是毫无疑义的了。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法典、一所法庭是为思想方式而存在的。

我们的这家“中庸”报纸责难最近一个时期的《莱比锡总汇报》说它报道不确实的消息，说它歪曲事实和造谣生事。因此，这家报纸义愤填膺地责怪我们，好象我们把撒谎说成是人民报刊的必然因素。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了这个可怕的结论，如果我们确实说过撒谎是人民报刊、尤其是德国人民报刊的必然因素，那又会怎样呢？我们指的不是观点上的撒谎，不是精神意义上的撒谎，而是指事实转载上的撒谎，是物质意义上的撒谎。用石头打它！用石头打它！——我们这位充满基督教情绪的主妇就会这样大叫大嚷。用石头打它！——大家也会随声附和地叫起来。但我们不会过于仓卒地来评判，我们将就事论事地来谈谈，我们不会成为空想家，而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位殷勤的主妇远说不上有什么空想。请我们的“中庸”报纸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报面吧。它（正如同《普鲁士国家报》，或是德国的一切报纸和全世界的所有报纸一样）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报道来自巴黎的不确切的消息、关于目前法国的内阁危机的流言蜚语以及巴黎某家报纸所透露的、而在明天或是一小时后便会被推翻的种种谎言吗？也许《莱茵——摩塞尔日报》认为，事实转载上的撒谎在英、法、西、土各栏是必然的因素，而在德国或普鲁士栏内却是罪该万死的行为。这是哪里来的两种尺度？哪里来的这种对真理的两重看法？同一家报纸，为什么在这一栏表现出长舌妇般的信口胡说，而在另一栏里却应该像官方机关报那样准确不可驳呢？这显然是因为：对德国报纸来说，只应该有法、英、土、西的时代而不应有德国的欣欣向

荣的时代，只应该有**德国的停滞不前的时代**。相反地，那些强使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全部炽热的兴趣和戏剧性的紧张情绪（这一切都随着每个**形成过程**，首先是**现代历史的形成过程**而出现）从**外国转向祖国**的报纸，难道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赞扬吗？甚至就假定这些报纸引起了不满和愤慨吧！但要知道，它们激起的是**德国的不满和德国的愤慨**，要知道，它们终归使背弃了国家的人心又转向国家了，尽管在初期回转的人心是激动的，愤懑的！它们不仅激起了不满和愤慨，而且还激起了忧虑和希望、欢乐和悲哀，首先，它们唤起人们热烈地**关切国家**，使国家同它的公民**亲密相联、休戚相关**。它们使柏林、德累斯顿、汉诺威代替了彼得堡、伦敦、巴黎，使它们成为德国人的政治见解的中心，比起把世界之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来，这是一个更光荣的功绩。

使德国和普鲁士成为德国和普鲁士居民注意的中心，把国家由神秘的僧侣式的东西变成公开的个个了解人人有关的现世界的东西，迫使国家和自己的公民建立起**血肉般关系**——不错，给自己提出上述各项任务的德国和普鲁士的报纸在报道事实的可靠性方面是会次于法英的报纸的，它们的报道往往是不巧妙的，是幻想的。但是请回想一下，德国人只是**凭道听途说**才知道自己的国家的，关闭的门完全不像**透明的玻璃**，而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国家并不是**公众的国家**组织。请不要把那种只是国家的毛病（也就是这些报纸正在力求改正的那种毛病）说成报纸的毛病吧。

因此，我们愿意再重说一遍：“**《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适合对**政治事实**直接感兴趣的人的口味，而我们则适合对**政治思想**感兴趣

的人的口味，自然，事实并不排斥思想，正如同思想不排斥事实一样。这里的问题只在于最主要的性质即特征。

.....

写于1842年12月31日，1843年1月3、5、7、9、11和15日
载于1843年1月1、4、6、8、10、13和16日《莱茵

报》第1、4、6、8、10、13和16号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6—194页)

·注 释

- 1、《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7年创刊。19世纪四十年代初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报纸。1842年12月28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境内查封该报，而在萨克森该报出版到1843年4月1日为止。
- 2、《科伦日报》是一家德国日报，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该报拥护天主教，反对普鲁士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新教。1842年反动政论家海尔梅斯——普鲁士政府的密探为《科伦日报》的政治编辑，该报曾猛烈攻击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
- 3、《国家报》是《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简称，1819年创刊于柏林。19世纪40年代该报是普鲁士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
- 4、《爱北斐特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34年至1904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在19世纪30—40年代有保守的倾向。
- 5、《杜塞尔多夫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26年至1926年在杜塞尔多夫以此名称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该报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
- 6、指《莱茵—摩塞尔日报》而言，它是反动的天主教日报，自1831年至1850年在科布伦茨出版。
- 7、《总汇报》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3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

- 8、指1837年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所引起的事件。这一专横的行为引起了哥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里姆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韦伯）的抗议，结果七位教授被撤职；其中有人被放逐。汉诺威事件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莱比锡总汇报》曾为哥丁根大学教授辩护。
- 9、《慕尼黑政治纪事》是《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纪事》的简称。这个杂志是教权派的杂志，自1838年起在慕尼黑出版。19世纪40年代，该杂志曾反对在普鲁士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新教，为天主教会辩护。
- 10、《黄蜂》杂志是一种讽刺性月刊，主编为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阿尔丰斯·卡尔，于1839年在巴黎出版。
- 11、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梯也尔，阿道夫(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总理(1836, 1840)；1848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奥尔良党人；曾任共和国总统(1871—1873)，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刽子手。
- 12、《汉堡记者》是《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的简称。在19世纪40年代该报为日刊，倾向于反动的君主专制。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¹ (摘录)

马 克 思

1月寄自摩塞尔河畔。《莱茵报》²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谈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

另一篇是描写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法令和该法令所给予的较大的出版自由在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居民中引起的**特殊**的好感。第二篇文章的语气是**尖锐**的，甚至可以说听起来是**刺耳**的。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但是，如果要证明他说的是真话，那也未必需要**逐字逐句**地加以证明，否则，任何提纲挈领的说法就都将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任何人说的话，若不一字不差地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把它的意思传达出来。可见，譬如有人说了“葡萄酒酿造者求助的呼声被看做**无耻叫嚣**”这样一句话，按理说，我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相等**关系。这就是说，需要证明的，是有某种大体上等于“无耻叫嚣”这种概要说法的东西实际存在着，因而这种说法也不能认为是不恰当的。如果得到了这样的证明，那末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实有其事**，而只在于**措词的准确**程度如何；而在那些难以捉摸的、最细微的笔调上所做的一切判断，都是最成问题不过的了。

我在上面所做的几点说明是有感于总督冯·沙培尔³先生公布在《莱茵报》第352号上的两个训谕而做的。在这两个标有“科布伦茨，12月15日”字样的训谕里，总督先生针对上述的两篇文章向我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之所以**迟迟**答复，首先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内容，因为一个新闻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随时准备详尽无余地叙述事情的一切细节和论证全部原因与根

源。何况这样做需要许多时间和资料。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中的一小部分，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挑选一定的职能。譬如，一个人多描写些他和人民来往时人民的贫困状况所给他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譬如历史学家，就研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感情丰富的人就描写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就研究消灭贫困所必须采取的办法，而且，这个**总的**问题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从地方范围，从整个国家范围等等。

这样，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

我迟迟答复的第二个原因是：《莱茵报》编辑部在接到我的第一篇通讯稿后，要我提供补充材料。它在接到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通讯稿后，也同样希望得到补充材料和现在这一篇最后的报道。最后，编辑部一方面要我指出消息的来源，另一方面又保留这样的权利，即在它没有用其他办法证实我所提供的材料之前不发表我的报道文章。^①

其次，我的答复是**不署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①我们证明记者所引的材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指出，由于我们收到一些彼此不同而又能互相印证的来信，所以有把这些信加以对照的必要。——《莱茵报》编辑部。

我确信**不署名**是由报纸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别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理性的机关**。作者的**名字**可以使一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如身体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一样，可是他的名字也会使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化为乌有。最后，不署名不仅可以使作者，而且还可以使广大读者更为自由和公正，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在自己面前看到的就不是说话的人，而只是所说的事；那时读者就摆脱了作为经验的人而存在的作者的影响，而仅以作者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

既然我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也就不打算在我所提供的较为详细的材料中指出官员的姓名和乡镇的名称，只有当我引证公开发售的报刊上的文件或者提及姓名无损于任何人时，才是例外。报刊有责任揭示**一般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应该揭发**个别的人**；指出个别的人，只有在不这样做就不能防止社会的某种祸害，或者事情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因而揭发一词在德文中已完全失去其原意的时候，才是必要的。

在我结束正文前面的这几点说明时，我认为我有权表示一点希望，但愿总督先生看了我对事情的**全部叙述**后，会相信我的意图是纯洁的，甚至会把我可能犯的错误归于我的某种不正确的看法，而不至于认为是出于恶意。这篇叙述本身就会表明，甚至在现在，我实际上会长期不发表自己的姓名的时候，我是否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指摘：说我**造谣中伤，企图煽动不满和引起敌意**；是否应该受到那种因出自一位在莱茵省极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之口而更形严重的指摘。